

当代中国

正在经历和平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

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如何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

如何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同时建设和谐的公民社会，

并与外部世界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

养成健全的国民意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国民意识养成的基础在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承担着主要的教化责任。

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第三期“211”工程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民意识与人文教育”列为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经过三年的努力，推出了一套四本“全球

思想史与国际政治

SIXIANGSHI YU GUOJIZHENGZHI

化与国民意识研究论丛”。此套丛书通过考察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同中国文化传统的联系和近代以来国民意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变，探讨在中西文化融通背景下生成的国民意识的特征与理论意蕴，剖析中国国民意识的内在机理和历史表现；并从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两个维度考察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双向互动和相互认知；作为国民意识教育的载体——历史教科书的国际比较则从教育实践层面提供经验性案例和理论、方法的借鉴。

冯绍雷 主编

思想史与国际政治

SIXIANGSHI YU GUOJIZHENGZHI

冯绍雷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史与国际政治/冯绍雷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9

(全球化与国民意识研究论丛)

ISBN 978-7-5326-3784-3

I. ①思… II. ①冯…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世界 ②国际政治—研究
IV. ①B1②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1668 号

责任编辑 林益明

装帧设计 杨 阳

思想史与国际政治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5 字数 379 000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784-3/D·113

定价: 7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5032807

序 言

关于国际政治与思想史的话题,和国内国际的同行们的讨论已经有若干年了。

最初,大约在十余年之前,是由来我校从事合作研究的国际问题领域的学者首先提出了有关想法,也即国际问题研究有一个相当重要、而在国内学界暂时被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国际政治与思想史的相互关系问题。几乎在同一时刻,国内也正在出现一个对于西方思想史的关注和研究的热潮。我周围有不少同行与同事们正在努力研读和翻译概念史专家昆汀·斯金纳的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之下,我作为一名主要是国际研究学者的阅读范围也出现了向这一方向的移动。

差不多在同时,大国政治中一些新现象的出现,也使我们更加关注关于思想路线和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联问题。一方面,是随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所出现的新保守主义倾向。2001年,也即小布什上任的第一年,我正好有一年时间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AIS)做访问学者,有机会接触了美国新保守主义阵营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也有时间阅读了这方面的相关著作。当时,令我深深关注的是,何以在20世纪80—90年代风行新自由主义之后,而后又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一度主导美国的外交走向。同时,在美国期间,我也有机会得以和两位在国内的年轻同事一起翻译SAIS的欧洲研究系系主任、大牌教授戴维·卡莱欧的一部重要著作《欧洲

的未来》。在这本书中，颇令我感触的，乃是这位大学者不光运用当时最为流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剖析当代欧洲走向，而且娴熟地引进西方思想史的研究，解析欧洲与诸大国关系的进程与走向，使得一部关于当代欧洲问题的著作既充满了人文气息与灵性，同时又大大加重了在展示欧洲乃至世界未来图景时的逻辑力量。

在戴维·卡莱欧看来，当代欧洲和欧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李斯特、马克思、凯恩斯和哈耶克这四位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交融贯通发生作用的结果。戴维·卡莱欧认为，李斯特的国民经济思想曾经是欧盟一体化过程中起引擎作用的“法德联盟”的动力之所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性，因而，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基本理念，至今对欧洲和整个世界产生深刻影响；作为既是国际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的凯恩斯，则主张新重商主义的国家应该得到加强，并且应在具有想象力的新的国家合作机制中和睦相处；而走得最晚的哈耶克强调的是无限制的国家权力的危险，他的主张至少被体现于欧洲建立单一货币联盟的不懈努力之中。

戴维·卡莱欧的基本结论是，摆脱当前世界困境的出路在于一种欧洲式的启示：不光是要像二战后的欧洲合作进程不是拒斥德国，而是包容德国（同时也是限制德国）那样，应该在北美与欧亚大陆诸国之间通过不断地构建合作机制，一步步地化敌为友，从而形成均衡的权力机制，以维持世界的稳定；同时，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像思想家们构筑欧洲合作的模式那样，要以更具创意的思想来推动上述的全球进程。

问题大概不在于戴维·卡莱欧的基本观点是否能够为当今国际社会所接受，这样的观点完全是可以见仁见智，展开讨论的；以笔者之见，戴维·卡莱欧的著述方法至少提醒我们：国际问题的研究远不止是对当前事态的就事论事的描述，也不仅仅是以“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一类概念去简单地图解复杂的国际现象。在构成国际研究的诸多知识门类中，恐怕政治思想本身的发展是相当直接地作用于当今外交与战略理念的一门学问。其理由很简单：当国际关系被最终体现为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之时，国际关系研究就必须以全部人类的智慧与良知来加以装备。

即便从功利的角度而言，小布什梯队成员与芝加哥学派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普京的外交战略究竟是传统的强国主义、欧亚主义还是欧洲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发挥更大作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伊斯兰世界变动更多地受到其宗教文化传统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借助于媒体被裹挟进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包括中国未来外交战略构建过程中将在多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运用传统文化的资源。也许，这样一类寻根究底式的提问并不直接指向具体的外交操作，但它却提供了把握大国关系发展趋势的脉络与门径。

对于国际政治研究这样一门年轻的学科来说，其近百年来的发展进程中有不少故事，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总结与反思。

以我个人所从事的地区和国别而言，比如，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了，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的研究方面，可能被我们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是在物质方面，而且是在思想方面。换言之，依我 80 年代后期在当地的观察，实际上，苏联的经济和综合国力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80 年代初，甚至是当时的苏联老百姓觉得生活还过得相当不错的时候。我以为，当时苏联精英阶层的一个重要倾向，基本上是希望通过自由和开放原则导向下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寻求出路。而从战略设计角度来看，“对话”这样的一个流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决心。无论人们对于苏联的败亡做出什么评价，思想的作用，恐怕是苏联巨变这样一个根本影响国际进程的重大过程中一个更为深刻而未被充分研究的问题。

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使人们深受困扰的不光来自于传统的大国竞争、经济与科技革命之下的不平衡发展、新兴力量的崛起之后带来的力量格局变迁，而且，尤其受困扰于包括宗教事务、民族与地区文化差异、依然存在的意识形态冲突、代际变化等等思想领域不依不饶的纷争。我一直有一个可能是过于大而无当的比较：为什么 19 世纪维也纳体制之后的欧洲国际社会能够维持“百年和平”？今天能否重现当年维持和平的若干机理呢？尽管历

史不可能重演,但是,是否其间的若干机理能够被重新复制,至少,使得这个疯狂的世界少受一些摧残和熬煎呢?这里,有两项结构性因素似与今天的世界有着类似之处:其一,一个多元化(有人说是多极化)发展的世界,当年欧洲不也是多极并存吗?其二,19世纪的欧洲大体上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种思潮此起彼伏、互相竞争而又互相适存的思想格局,似乎今天一定程度上,我们也能够看到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者并存的局面,那么,这种类似的状态是否有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思想史与国际政治相结合的研究,来探寻一条价值重建的路径呢?

两年前,我的一位年轻同事曾经向我推荐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为:“国际历史和国际关系:五十年的分离”(“*The Fifty Years' Rift: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这篇文章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思想界曾经发生过非常深刻的转型,批判传统的政治思想,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思想与理论研究的著作。

但是,当时在西方政治思想家中,特别是而后逐渐占据主流的语义学派,长期以来主要研究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能力,国际问题并不是当时的研究重点所在。所以,当政治思想史学界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候,并没有发生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革命。即使是英国学派的创始人,如马丁·怀特,发表了批评性很强的文章,猛力批判国际理论研究领域缺失历史学的传统,甚至是指责国际研究的思想 and 道义的贫乏。但这也依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原因还是在于政治理论当时关注的重点是国内、而非国际关系。

这位学者写道:“所以,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和历史被一种共同的语言分成了两个领域。一方面,当着外交史——按照严格的历史学理解,外交史仅仅是根据外交档案来写作的——渐渐地从历史学关注的中心转向边缘的时候;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变得既是越来越理论化,比如国家行为的模式化;同时也变得更加实证化,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很大的抱负,是企图以自己还很不健全的学科构建,与其他社会科学并列。方法和抱负之间的这种日益疏远,看来是对于国际关系学本身,造成了比对于历史学更

大的影响。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历史学继续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历史学则少有人问津所谓的国际关系学”。

凡是熟习国际事务和国际历史的读者一定都知道，实际上从修昔底德到兰克，从霍布斯、康德、一直到 20 世纪早期政治思想家的作品，历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写作的主题往往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兴奋点：战争与和平，外交与法，主权和国家，文明与人性。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谱系上，实际上，历史学家，包括政治思想家们早就登堂入室了。但是在过去的将近半个世纪里，这样的联系被中断了。甚至于这样关系紧密相连的两个学术领域的疏离本身，就是值得思想者们研究的一个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将思想研究和国际政治研究相互贯通的新的一轮努力正在开始。

就整个国际研究领域而言：

首先，是建构主义的兴起。对于这一流派的地位和作用尽管充满争论，但是其意在寻求主客体之间有效对话的努力，几十年来深刻影响了国际社会。尤其是随着网络等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本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已经是国际关系研究界以及决策界不可或缺的基本话语。国际政治研究开始寻找自己语言系统的努力，包括维特根斯坦、奥斯汀、伽达默尔、福柯等思想家，虽然较晚，但是毕竟开始了对于国际关系学研究产生影响，一方面，这使得国际关系学开始回归国际思想历史的研究，同时，使得政治思想史能够包容国际关系研究的这样一些宏大进程。

其次，对于国际历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一些重要思想家，诸如格劳修斯、马基雅弗利、霍布斯、休谟、康德，包括马克思等人的重新燃起研究兴趣，使得国际政治与政治思想的结合在一些关键时段与重大问题上具有了突破的可能。

为什么思想史与国际政治的相互结合有可能使得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国际政治的研究都有可能出现一番新的局面呢？有人认为，首先的原因在于思想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哲学史的著述通常着重于不同时代

从思想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内容比较专业,也比较抽象,但是思想史却探求每个时代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一般从事国际政治和国际文化的人士而言,就更加来得易与把握和理解。特别是由于有一些思想史的著作,不光关注“上层文化”,而且关注民间的思潮,比如,赵复山先生在翻译弗里德里希·希尔的《欧洲思想史》的时候,就深有此感。这就使得思想、思潮和国际政治现实之间有了更多相互之间融通和观照的渠道。

其次,思想史研究的是观念形成的路径,特别是关注概念和范畴在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和意义的增益。这对于理解当今世界这样一个越来越多样化的国际政治局面而言,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在多种文明背景之下,对于一些相同范畴的使用,实际上是有着很不相同的语义背景的差异的。因此,通过思想史方法的诠释,使得那些流传非常广泛,以至于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但是恰恰对于实际国际政治正在发生重大影响的概念与范畴,比如,“民族”、“民主”等等,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明白的语义的解读,这将大大有利于国际政治生活的健康化。

进一步言之,凡是那些优秀的思想史著作,比如,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理查德·塔纳的《西方思想史》、约翰·麦克米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都是那样一种跨越政治、宗教、科学、艺术等各个知识领域的大恣汪洋、才情纵横的巨制。这些作品大大有利于人们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藩篱,打破对于世界事务的偏见,提升对于那样一种丰富多彩的国际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史和国际政治研究的结盟真是一件值得推动的事情。

有鉴于当下正在出现这样一个难得的转机,也借教育部 211 项目提供支持之际,我十分感谢为本书的写作作出奉献的同行们。他们有的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和地区发展研究院,也有的远在国外、在北京、在其他合作机构从事研究和教学。他们经过多年的研究,贡献了本书所包含的各项精彩论题。在这批论文中,既有从哲学高度对当下国际发展进行观察的学术分析,也有从经典思想研究出发对于国际历史进程的比较观照,包括了运

用思想史、概念史方法对于重要国际政治现象的解读,也有着对于一系列国际问题理论家、重要国际与国内现象的思想理论解析。需要指出的是,本项研究实际上还受到了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专家们多年来的鼓励与支持,无论在队伍的形成和理念的提升方面,这种非常宝贵的理解和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考虑到将思想史和国际政治相结合的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所奉献上的这一卷作品,依然还是这项长期工作的一个开端,因此,也自然诚恳地求教于海内外各方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冯绍雷

2012年8月修改于清水湾

目 录

序 言·····	冯绍雷	1
----------	-----	---

上篇：多学科背景下的理论问题

概念史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李宏图	3
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缘起·····	刘 擎	28
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	童世骏	41
非殖民化与欧洲外交转型 ·····	潘兴明	62
美国军政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兼论美国民主制度的运作与前景·····	于 滨	87
孤立主义及其对当代美国大战略的影响·····	刘 军	123
“国家理由”，还是“国家理性”		
——思想史脉络中的“reason of state” ·····	周保巍	147

下篇：理论家及其思想

亨廷顿政治发展理论以及福山的当代诠释·····	冯绍雷	165
-------------------------	-----	-----

施米特与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	徐凤林	190
马丁·怀特与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思想传统		
——兼论对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吴征宇	213
基督教信仰和俄罗斯帝国认同中的欧洲、俄国、中国		
——关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国际政治思想研究·····	林精华	232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对于国际政治的启示·····	郭小丽	269
封闭海洋：塞尔登对格劳秀斯“海洋自由论”的挑战		
——关于研究方法的批判性导读·····	林国华	299
西蒙斯的“论自然法与万民法英译本导言”·····	邱立波译	354
后记·····		395

· 思 想 史 与 国 际 政 治 ·

上篇：多学科背景下的理论问题

概念史视野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李宏图

—

目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且开始尝试将两者打通和相互结合,借助于思想史对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研究从而更好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和把握现实的国际关系走向。^① 如果类比于目前在西方历史学界所出现的“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这一称呼的话,是否我们也可以将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趋向称之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思想史转向”,它将预示着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突破和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如何将国际关系研究推向深入,我们是否需要思想史作为我们的一种研究工具,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把国际关系看作是在国家与国家层面上所展开的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实践的话,那么,我们更可以肯定地说,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的确需要思想史研究,需要思想史研究作为其重要的学术资源和支撑。例如美国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新保守主义,这样,要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就必须知晓新保守主义。而新保守主义从最早的保守主义鼻祖英国的思想

^① 例如冯绍雷的文章“未被忘却的思想史”,《世界政治与经济》2003年第4期。

家伯克开始,经过很多思想家的传承,演变成了目前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在这一思想演变环节中就有考杰夫、斯特劳斯等思想家。这样,我们必须研究这些思想家,这就需要思想史,实际上,这本身就是思想史。再例如 2003 年,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为了给这场战争找到合法性的根据,美国称自己为“解放者”。这个称呼本身就隐含着一种思想原则在其中,而我们也就需要研究这些思想和原则。还有目前中国和欧洲之间对于人权问题和市场经济的地位等问题的分歧,也都内含着一定的思想原则在其中,这样,只有理解了这些思想原则才能更好地知晓他们的战略和政策,从而制订出相应的对策。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我们还是用英国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的话来作一概括吧。他这样说道:对政治行为的解释主要取决于对政治思想和原则的研究,不提到或者研究这些政治思想和原则,就不可能对政治行为进行有意义的解释。他还说,在政治中,行动的合理性往往受到将其合法化的可能性所限制。然而,你所希望的合法化取决于在现存的规范原则下,你能编排出什么样似乎合理的行动过程。而这则意味着,虽然你假装承认的这些原则从未充任为你的行动动机,而只不过使你的行为合理化而已,然而,这些原则仍有助于形成或限制你能成功选择的行动路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去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会选择特定的政治,并以特定的方式去追求和表达,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去研究这些原则。^① 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实践、政治行为都与一定的思想观念有着联系,也与对这些思想观念的表达有着紧密地联系。尽管斯金纳没有特别地讲到作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但将思想史纳入到国际关系研究,借助于这一方法从而把我们的视野扩展到作为政治实践和政治行为的国际关系研究,其道理也应是不言而喻的。

^① Quentin Skinner: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pp. 105 - 10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二

毋庸讳言,国际关系研究需要思想史研究参与其中,使其更为丰富多彩,并在新的维度下得出富有建设性的成果。当然,就思想史研究而言,其方法和流派也很多,我们该怎样选取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入国际关系研究,实现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结合。在此我认为,概念史研究是一条比较好的路径。

目前,概念史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从空间来说,如英国、德国,荷兰、美国、土耳其等国家的学者对概念史的研究十分踊跃,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甚至可以说是学派。这些志同道合的学者们还组织了国际概念史研究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组织课题研究,开办概念史讲习班,甚至进行跨国度的联合研究。即使在亚洲地区,韩国和日本的学者也展开了概念史研究,2008年在首尔还召开了国际概念史学术讨论会。就国内来说,尽管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了概念史研究,但还没有一种理论的自觉,国内对概念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进行过系统地介绍。

要回答什么是概念史就必须回答什么是概念。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没有对这一问题作出定义性地解释,但在“概念形成”这一条目中,讲到了这样的话,概念是以自身为依据而形成的。在《辞海》中,对概念解释为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跳出这样的哲学意义的解释之外,结合概念史来看,概念是与词汇密切相连,但概念不等于词汇,同样,也并不是每个词汇都是概念。前几年,国内学界曾经翻译出版了英国学者威廉姆斯的《关键词》,由此也使得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对关键词的研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所谓的关键词就是指“概念”。就词汇和概念的关系来说,当一个词汇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并被固定了下來之